



# 建设全球城市前景下的都市体育功能转型

## ——对“十二五”开局后上海体育事业的展望与忧思

黄聚云

**摘要:** 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基本视角,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人口负荷、必须应对的结构性冲突、需要推进的深层变革三大方面,论述了上海都市体育发展的前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十二五”规划;全球城市;国际大都市;上海;体育;功能;转型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1)02-0003-05

Urban Sports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in Prospect of Constructing a Global City

-----Prospects and Worry about Sports in Shanghai in the Beginning of "12<sup>th</sup> Five-Year Plan"

HUANG Ju-yun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asic angle of turning Shanghai into a global city,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rospects of Shanghai's urban sports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city is facing and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we may take from the aspects of population pressure of Shanghai in constructing a global city,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the city has to deal with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that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12<sup>th</sup> Five-Year Plan; global city;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Shanghai; sports;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全球城市是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全球城市是世界发展潮流的引领者,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国际经济决策的总枢纽。”<sup>[1]</sup>国际公认的全球城市有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上海在综合竞争力上与全球城市还存在不少的差距<sup>[2]</sup>,上海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际化大都市,在经济结构、科技创新、政府职能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sup>[3]</sup>,但是上海正在向着全球城市的目标快速迈进。

将上海建设成全球城市是一项国家战略。1992年,中央确定上海是“一个龙头、三个中心”;1996年,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目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目标;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里,正式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2005年,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把2010年作为形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框架的时间节点,并要求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阶段性进展<sup>[4]</sup>。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又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上海处于这一“世界级城市群”战略构想的核心地位。上海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排头兵,也是内地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现代化、跻身世界顶级城市序列的都市。

这种超卓不凡的城市定位与壮观强劲的发展态势,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上海体育事业的存在形态、演进取向和功能

诉求。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上海体育事业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宏伟战略。在此整装待发之际,若能从全球城市角度对上海中长期发展的基本前景进行一些带有忧患意识的推断,则对于体育事业的理性运行和体育功能的良性发挥将有不小的助益。只看到“形势一片大好”或者一厢情愿地呼喊良好意图的政策口号,是不够辩证和客观的,多想一些困难和问题可以使今后的道路走得更加稳健。

### 1 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人口负荷

人口状况是制约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首要因素,也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依据。上海在建设全球城市的进程中将迎来一系列人口问题。

#### 1.1 超大的人口规模

保持一定条件的人口增长,既是大环境的迫力使然,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外部来说,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将持续很长的时期,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有拉大的趋势,造成了人口向上海流动的无形“势能”。从内部来说,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就必须具备庞大的人口规模,一方面必须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国际精英、技术移民聚居上海;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吸纳国内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这内外两种原因导致上海人口不断增加。2005年上海常住人口为1 778.42万,人口密度为2 805人/km<sup>2</sup>;2009年常住人口增长到1 921.32万,人口密度达到3 030人/km<sup>2</sup><sup>[5]</sup>。而

收稿日期:2011-03-10

作者简介:黄聚云,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社会文化与体质健康、农村社区。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理论教研室,上海 200438



根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预测,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将达2 140万人,2020年将达到2 250万人<sup>[6]</sup>。超大的人口规模给城市提供无穷的活力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压力和挑战。在体育方面,对经费投入的总量、硬件建设的规模、体育人才队伍都会提出巨大的要求;会加重大型体育活动管理上的难度,降低体育环境的舒适度。

### 1.2 人口老龄化

2005年,上海户籍人口当中60岁及以上者为266.37万;到2009年增至315.70万<sup>[5]</sup>。根据预测,2015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28.10%,2020年为34.10%,2030年为38.00%<sup>[7]</sup>。另外,人口预期寿命也在延长:2005年,上海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80.13岁,2009年增长到81.73岁<sup>[5]</sup>。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医疗卫生手段的改进,这一数字将会继续加大。

老年人有养老、健康和休闲三大需求,人口老龄化会给城市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还有可能对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造成冲击。体育是老年人维护健康、防治疾病、善渡余暇、安享晚年的重要手段。体育在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积极效应将使它在未来上海各项社会事业中扮演极其抢眼的角色。体育与老年人的“结盟”关系将会不断巩固和强化,并深刻地模塑着它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老年人体育将成为体育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的强势领域,医学、社会学、体育学、城市学和老年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模式是大势所趋。综合了医疗、养生、健身和养老多种技能的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将成为热门,并开始活跃在家庭、健身苑点和专业服务场所。社区体育将成为老年人体育不折不扣的代名词——当然,由于城市区位结构的变化,社区体育可能不会象目前这样散布于各个居民小区和健身苑点,而是被推挤到城市空间的边缘和郊区。社区体育和老年人体育的硬件建设将在未来数年之内退居次席,而软件建设将成为主要的考虑。

在老年人口以惊人速度增加的同时青少年人口比重却在走低。2005年,上海户籍人口当中,17岁及以下人口为161.07万;到2009年下降为146.11万<sup>[5]</sup>。由于养育子女成本的大幅度提升和平均婚育年龄的推迟,这一现象仍将延续。对于体育事业而言,儿童青少年是体育后备人才的源泉,在都市青少年当中高发的各种体质健康问题使得上海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择面非常有限,而儿童青少年的减少让本来就很有限的选择变得更加“拮据”。上海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不得不借助异地选材,而异地选材模式还有待拓展和完善。在异地选材不能获得显著成效的情况下,上海的竞技体育水平的保持就要依赖高水平人才引进。这在国内竞技体育的场域下(如全运会的较量)不免引发利益关系的纠结和城市自豪感的削弱。

### 1.3 人口多元化——国际人口增加带来的新挑战

在建设全球城市的进程中,还有一个人口问题将变得日益突显,那就是国际化移民。全球城市例如东京、纽约、伦敦的国际人口比例分别为4.55%、24.00%、27.00%,常住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占到了本地人口的15.00%左右,具有较强的人口多样性<sup>[8]</sup>。而上海常住的国际人口2005年为10.00万人,仅占常住人口的0.56%;2009年为15.20万人,占0.79%<sup>[5]</sup>。与上述三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上海的国际人口还有广阔的

增长空间。而要建设全球城市,上海需要源源不断地吸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教育、文化、传媒、娱乐、时尚和体育等各领域的高端人才,再加上各种国际组织机构驻沪工作人员,以及短期逗留的外国官员、外交人员、商人、记者、观光客、学者、留学生和劳工等,届时上海的国际人口即便按照10%的保守比例估算,也可能常年维持在200万人以上。

国际人口的规模化首先带来的是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政令宣教”式的单一交流和工作模式将会无所适从。国际人口的精英移民性质使他们可以轻易地在各自的领域获得话语权和掌控权,并造成社会财富与资源的偏态集中,加大城市精英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分化。他们的高度自主、流动的特性也给城市管理、安全防护造成很大的压力。跨文化的国际人口一旦结成某些联合行动群体,将会成为一种难以被行政部门约束的强大力量。这些都是上海为了获得世界顶级城市应具的活力而必须承担的风险和代价。

国际人口的崛起将给上海的体育事业带来全新的面貌和感受。各种体育工作的参与主体、服务对象和开展方式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各种重要的国际体育组织机构和赛事纷至沓来。体育院校及科研机构将充斥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学生和进修人员。大型体育活动的管理者、操作者甚至连志愿者都日益由外国人构成。不仅高端的竞技体育和商业体育,就连寻常的健身指导、休闲娱乐、体育教学中也将是满眼异域的面孔。体育工作日益培育出“本土空间下的国际交流”的功能属性。跨文化交流能力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体育工作者的优势素质。国际人口对体育的需求和品味与普通的国内居民截然不同,体育作为阶级、阶层地位再生机制的后果将会受到关注。“全民健身”的“全民”也将不得不重新进行操作化定义。

面对一系列的人口压力,上海体育事业不能停留于被动的“防范”和“应对”的层面,而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策略,主动融入改善人口素质、“赚取人口红利”的工作当中。

## 2 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必须应对的结构性冲突

### 2.1 来自其他城市的挑战

全球城市是一个国家引领世界的战略平台,是繁荣国家引以为豪的标志性工程,是发奋图强民族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sup>[9]</sup>。所以,建设全球城市战略的实施必将招致其他国家和城市的挑战。这场城市之战,以政治、军事为后盾,以经济为主力,以科技为先锋,以文化为策应,全方位、多维度地展开。上海在这场全球城市角逐中处于第二序列的前茅,它不仅要赶超第一序列城市,还要与其他城市保持距离。但就经济产值而言,上海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就可成为全球之冠,但是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优化上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在人口素质、科技创新、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上海很难确立优势。

从体育领域来看,上海目前锚定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国内城市,即便在与这些对手的竞争中也是喜忧参半。上海迄今没有主办过奥运会、亚运会,在举办高水平赛事的资历上,落后于北京、广州,但是世博会的成功举行证明



了上海的大型活动的承办能力。F1赛车、网球大师杯等已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上海的几支职业俱乐部在国内保持着较为领先的位置。为了张扬与全球城市的地位、名号相匹配的城市文化,以及满足全球城市市民超乎寻常的精神需求,上海将大张旗鼓扶持那些最具品牌效应的竞技体育——尽管很多时候,这些举措缺乏经济效益,也与国家荣誉无关,但是影响到城市的形象。像这样通过“大手笔”的“城市文化工程”来证明城市能力,与通过合理的运营来原发性地培育出城市文化品牌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竞争的特点,而这种非理性竞争是在一个强手环集、适者生存、变革加速的时代迫不得已的“理性策略”。当然,“城市文化工程”并不仅仅影响城市形象,还关联到成千上万人的现实利益和诸多领域的进退兴衰。体育参与城市竞争,使体育成为建构城市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上海在全球层面的崛起,在竞争对手或者参照目标的选择上应该更加倾向于那些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要全面细致地搜集、整理关于这些城市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信息,尤其是要投入足够多的精力考察市民的体育生活,吸取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建构赢得国际社会认可的上海都市体育——那不是以北京等国内城市为参照的“海派体育”,而是以全球城市网络层级体系为坐标的“上海主站点体育”。

## 2.2 全球资本与国家意志的矛盾

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国国家意志与全球资本的博弈过程。将上海建成全球城市是国家意志确立的战略目标。而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和宠儿,更加简单地说,是最有效地吸引了全球资本的城市。成为全球城市意味着要千方百计地迎合全球资本,因而容易使城市的发展依从于全球资本的逻辑。全球资本与国家意志在城市命运支配权上的争夺源自二者固有的截然相反的特性:全球资本以最大限度榨取全球资源、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国家意志要维护国家利益,具有区域局限性。全球资本和国家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经常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应该正视全球城市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可能存在的突出矛盾,因为全球城市的政治功能是在地区的范围内展开的,而其经济角色则日益在全球的层次上发挥着作用。作为这种斗争的结果,社会冲突就会在城市内部出现<sup>[10]</sup>。这在体育领域可能表现为:在体育体制上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二重性;在体育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难以平衡;在竞技体育的荣誉诉求和经济准则间的种种矛盾;在社会体育的公益主张与盈利取向间的分歧;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全球化运营与原生态继承之间的争鸣。

全球资本与国家意志矛盾冲突的另一种表现是:全球资本塑造的全球经济等级体系“对国家的自大性在心理上的打击”,“美国人自认为天下无敌手,世界第一,以自己种族主义者的方式进行思考,日本人和德国人也是如此。与其他民族相比,具有历史优越感的民族假定体现在法国人、中国人和穆斯林的文化之中。这些民族幻觉正遭受到强有力的攻击,也由于不断涌现的经济现实而变得复杂化。”<sup>[11]</sup>全球资本对国家“自大性”的心理打击极有可能会削弱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在体育中的霸权地位,消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形成的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竞技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与“国家荣誉”之间的牢不可破的结盟关系。在国家意志

可能淡出的情况下,都市体育固有的商业亲和特性使其非常容易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之下丧失“神圣性”和“民族意识”,如果国家意志未能发展出一种保证自己的特色、优势并最终胜出的智慧的话,则都市体育将沦为一种由众多市民集体无意识地参与以获取肤浅的消费体验的身体游戏<sup>[12]</sup>。

## 2.3 城市竞争力与幸福指数的落差

建设全球城市需要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sup>[13]</sup>。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而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幸福感的量化指标。对社会个体而言物质财富与幸福感之间并不成正比;对城市而言,竞争力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也不存在正相关。上海近年来综合竞争力提升很快,但居民幸福指数改观不大,在高涨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的逼迫下,甚至出现下滑态势。依据《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对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的评估和排名,上海列第41位,是内地得分最高的城市<sup>[14]</sup>。但依据“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入围的前10座城市分别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和长沙。上海根本就榜上无名<sup>[15]</sup>。可见,上海的城市竞争力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确实存在一定落差。

居民幸福指数与民生和民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度。2009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示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重视和关注国民幸福指数<sup>[16]</sup>。学界还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以幸福指数取代GDP”的主张<sup>[17]</sup>。体育界学者还开展“北京奥运会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及评价体系的构建”等研究,认为北京奥运会对幸福指数相关指标的直接影响力体现在奥运会提供竞技欣赏,提升国民的愉悦感;遵循公平理念,提升国民的公平感;促进全民健身,提升国民的健康感;激发爱国情怀,提升国民的自豪感等方面。北京奥运会对幸福指数相关指标的间接影响力体现在奥运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民的富裕感;创造绿色生态,提升国民的舒适感;营造人文氛围,提升国民的文明感;展现科技成果,提升国民的现代感等方面<sup>[18]</sup>。不可否认,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对于提升幸福指数是有贡献的,但是一个巨型城市的居民的幸福指数不能寄托在某些短期的、一过性的活动的基础之上。在笔者看来,幸福指数依赖于某种持久的社会联系和稳定的社会场景,而建设全球城市则必然会增加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在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全球城市固有的变动不居的特征对居民的幸福感的获得天然具有一种抑制作用。大型赛事给居民提供的是一种外在的“共同想象”、璀璨绚丽的“都市景观”、幻真莫辨的“文化拟像”——它超然凌驾于个体生活之上,与个体的生老病死漠不相关,它所激发的许多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如暴风吹动的波浪一般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悄然平息。要切实实地发挥体育提升幸福感的功效,就必须使其融入社会成员最为重要和关切的生命实践之中,换句话说,让体育以“民生文化”、“生命文化”而不是“时尚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面貌在都市发展。



### 3 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需要推进的深层变革

#### 3.1 从关注经济到关注民生

民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问题。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关注和保障民生仍将是“十二五”乃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种社会事业包括体育事业发展的优先考虑。

社会建设的民生转向促发了一股“民生体育”的热潮。“民生体育”指的是政府以民本思想为基点，以公民身心健康为宗旨，以惠及社会每个公民的健康权和幸福感为任务，而举行的一系列体育活动。“民生体育”有3层含义：①消除“大众”与“精英”的硬性厘定；②突出民众在体育中的主体地位；③回归体育的公益和公共服务色彩<sup>[19]</sup>。综合目前学界和媒体的观点，“民生体育”的实施途径主要概括为：①公共体育资源的均等化配置；②保障弱势群体参与体育的权利；③改变片面重视竞技体育的现状，加大对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投入；④健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体系；⑤保障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⑥发展农村、偏远、落后、民族地区体育事业；⑦完善相应体育立法；⑧加强国民体质监测；⑨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落实“雪碳工程”；⑩提供相关人才保障等。

上海要开展“民生体育”，除了借鉴上述主张外，还要依据自身经济水平高、人口多元化等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笔者看来，要在进一步加大全民健身硬件建设的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软件建设上来，抓好老年人、儿童青少年、妇女、农民工、高级知识分子和国际人口六大人群的体育服务保障工作。老年人“民生体育”的重点在于提供公益且专业的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儿童青少年“民生体育”的重点在于克服“教育柔性化”的弊端<sup>[20]</sup>；妇女“民生体育”的重点在于在婚育年龄推迟、高龄产妇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优生优育；农民工“民生体育”的重点在于健身知识与方法的宣传和普及；高级知识分子“民生体育”的重点在于与脑力劳动关系密切的疾病的防治；国际人口“民生体育”的重点在于从其精英品味出发发展高水平观赏体育和高档健身，并努力向其推介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背景下发展“民生体育”就必须挖掘体育缓解、治疗都市病的功能。

#### 3.2 从“社会转型”到“后社会转型”

按照学界主流观点，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sup>[21]</sup>。社会转型内蕴了现代化诉求，是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思路、把握体育发展态势的重要依据。都市是社会转型的前沿阵地，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能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一骑绝尘，但是触手可及的现代化前景并不能宣告上海社会转型的终结，恰恰相反，因为对全球竞争更加深刻地参与，上海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型期。笔者称为“后社会转型”。“后社会转型”不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而是从

区域型现代社会向全球型现代社会的转变。“后社会转型”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处境进行重新定位和调适的过程。“后社会转型”的主体不再是“社会结构”，而是主导人们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文化体系。

“后社会转型”对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力：第一种力逼迫上海体育事业走向世界、融入全球资本主导的文化霸权之中；第二种力要求上海体育事业反制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泛滥等不良后果、维护上海区域社会生活的相对宁静。都市体育将在这两种相反的伟力的撕扯之下变得“二元对立”、“时空分裂”：一端是万人攒动、喧嚣嘈杂的国际赛场，一端是鸟语花香、鸡犬相闻的老年健身社区。然而第一种力在全球城市的场域下终究要比第二种力强大，前者对后者的步步紧逼极有可能导致奠基于静态生活方式下的体育形式从都市中心向郊区的撤离，当近郊沦陷之后，它们将被迫迁往远郊，如此步步败退，直到空间距离遥远到足以抵消全球城市的强大张力为止。从而围绕空间维度形成风格截然不同的两大体育形式。生活于都市城区的人们每天都处于全球化文明成果的疲劳轰炸之下，当他们感到厌倦时，到远郊进行带有休闲、度假、冒险、猎奇等色彩的体育旅游将成为极受欢迎的调剂手段。这种时空上的分裂将成为未来上海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用空间转移来换取生活方式上的平衡将成为每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参与体育即意味着时空穿梭，以体育为业即意味着在极化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平衡，对体育的研究也将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引入空间转换的预设。

#### 3.3 从“海派文化”到“新海派文化”

全球城市的建设不仅需要结构的优化，也需要文化的创新。上海素以“海派文化”著称。“海派文化”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吴越地方文化为根脉，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为空间载体，由东西文化交互、冲突而形成的文化体系。“海派文化”有新旧之分，“旧海派文化”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至巅峰，建国之后其个性渐趋湮灭，但是其影响仍然持续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代上海的各种文化形式的创作与走向。“新海派文化”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经过对“旧海派文化”的扬弃而萌发，倡导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开拓进取的创造性等优势特征。就目前而言，“新海派文化”仍处于培育阶段。

要弘扬“新海派文化”、提升上海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充满活力的都市体育文化，就必须克服如下几个问题：①急功近利、底蕴薄弱。在体育工作中表现为过于看重体育活动的规模档次、外在形式和轰动效应等，而忽视实质健身效果；过于看重休闲娱乐而忽视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使得体育始终游离在文化核心领域之外，而无法得到足够高的文化地位。②学术精英脱离文化创新。在既有的学术评价体制之下，体育界的学术精英把更多的精力消耗在“学术泡沫”的制造上，无暇顾及体育文化的创新。实际从事体育文化“创新”的人员又常常缺乏宽广扎实的体育科学文化知识。③利益驱动之下日益泛滥的群体非理性。为了获取利益，许多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体育知识和方法，在媒体和商家的包装、炒作之下，打着“专家”、“科学”等旗号而四处传播，导致广大群众上当受骗。这些现象有



愈演愈烈之势。④拟像化造成的“无深度感”。体育对媒体的高度依赖客观上造成了“体育就是媒体中的体育”的假象,媒体对体育的呈现不仅带有各种或隐或显的偏差,而且大张旗鼓地鼓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媒体对体育的处理不仅带有技术加工的成分,而且带有价值编码色彩,接受媒体所呈现的体育拟像,实质上也等于在接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洗脑与灌输,其最终结果是体育沦为一种脱离了生命本真的视听体验,从而导致体育生活的无深度感。⑤文明产品的成瘾症。现代文化的增长建立在欲望扩张的基础之上,多数新兴的文明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创造的,并且从最初就带有进一步刺激欲望的用意,从而引发了普遍的成瘾症,其中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危害最大的有“电脑游戏成瘾症”和“网络成瘾症”等。都市是现代文明产品高度发达的地区,因而也成为“瘾君子”的乐园。

在都市文化创新最容易陷入的各种误区的背后是现代都市一个日渐加剧、难以扭转的重大困境: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形式合理性——如专家的肯定、官方的认可、媒体的赞扬——以其便捷易行、回报丰厚而超然凌驾于实质合理性之上,成为现代生活的支配性准则。形式合理性在都市泛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都市文化乃至整个都市生活异化为一种对生命的压迫性力量,生活于都市尤其是全球城市即意味着比其他人类更加剧烈的生命能量消耗。这里充斥着绚丽多彩的成就标识,但是没有生命的本真。而原应是生命本真展现的体育也可能在形式合理性的迷醉之下变成一种对生命进行肤浅的规制的力量。要摆脱这一悲观前景,就必须从现在起培养和践行一种尊重和关爱生命的意识。

#### 4 结语

在本文驳杂散乱的多角度论述中含有一显一隐两条主线:显在的主线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前景,内隐的主线是都市体育的功能转型。现代中国对体育功能的社会诉求大体经历了一个重心转移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强调体育为国争光等政治功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日益重视其经济功能,自2005年之后又不断挖掘体育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近年来又开始论证体育对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功能。这些功能诉求将会在上海未来的城市发展中继续保留,但是会随具体情境而有不同表现。就全球城市的重视经济、强调竞争、精英主宰、高度流动、变动不息等基本特征而言,现有的体育形式和工作方式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挑战,都市体育的正功能和负功能都将进一步彰显:一方面都市体育被视为救治都市病、现代文明病、现代性弊端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都市体育又以或主动被动、或有意无意的方式沦为引发弊病的因素的组成部分。

从客观上来讲,都市体育极有可能在全球浪潮的冲击之下变成一艘失控的船舰;但从主观上来讲,应该始终坚定不移地追寻体育作为一种生命文化的深刻内涵,至少在学术界应该如此。为了做到这一点,体育界学者应该对民众的体育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体育工作的思想导向应该由强调意识形态转向强调民众心声;由重视国家荣誉转向重视公民权利;由助推经济转向经济反哺;由形象工程转向民生工程;由局部优先转向公平均等;由系统世界转向生活世界;由文化普及转向文化创新。而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定位,一方面应保持立意高远、追求卓越,另一

方面,也要谨防急于赶超、脱离国情;一方面要率先发展、跨越式前进,另一方面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方面要提升层次和品位,另一方面要保证和谐和公平;一方面要积极服务经济建设大局,另一方面要主动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笔者将这一在讲求均衡前提下的转变称作体育功能的民生转向——“民”是“民众”的“民”,“生”是“生命”的“生”——它是体育功能的理性回归和内蕴升华,是体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地区战略规划时应该明确的重要思路。

#### 参考文献:

- [1] 倪鹏飞. 香港建设全球城市的基本构想与对策建议[J]. 开放导报, 2009(4): 62-67
- [2] 倪鹏飞, 侯庆虎. 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比较分析[J]. 综合竞争力, 2009(1): 10-17
- [3] 课题组.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全球城市的构建——上海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面临环境与总体思路[J]. 科学发展, 2009(6): 3-26
- [4] 余佳. “全球城市”的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上海的实证分析[D].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44
- [5] 上海统计年鉴[EB/OL]. <http://www.stats-sh.gov.cn/2004shtj/tjnj/tjnj2010.htm>
- [6] 孙刚. 2015年: 上海常住人口2140万人[N]. 解放日报, 2010-7-7(6)
- [7] 仇逸. 2015年: “老龄化”“少子化”并存[N]. 新华每日电讯, 2010-7-31(2)
- [8] 要英, 邓卓. 全球城市: 国际竞争的最新产物——评周振华新著《崛起中的全球城市》[J]. 上海经济研究, 2008(3): 112-114
- [9] 刘士林. 上海加强文化建设及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研究[J]. 甘肃社会科学, 2009(6): 77-79
- [10] [英]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全球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0: 408
- [11] [美]威廉·格兰德. 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1(1): 50-58
- [12] 黄聚云. 全球语境下的体育强国理念[J]. 体育科研, 2009(4): 11-14
- [13] 倪鹏飞, 谢海生. 中国城市竞争力2009年度述评[J]. 综合竞争力, 2010(3): 26-33
- [14] 黄仁伟, 吴雪明. 上海国际竞争力评估与比较分析[J]. 社会科学, 2009(10): 25-35
- [15] 张洁. 浅议国民幸福指数与GDP[J]. 经济师, 2009(2): 64
- [16] 方丹, 赵华朋. 对幸福指数研究的哲学思考[J]. 西安社会科学, 2010(2): 40-41
- [17] 徐景安. 以幸福指数取代GDP[N]. 社会科学报, 2010-2-25(3)
- [18] 王智慧, 李卫平. 北京奥运会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及评价体系的构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9(3): 10-15
- [19] 陈小林, 王正伦, 周瑜. 民生体育论[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7(4): 5-8
- [20] 黄聚云. 全民健身中的若干认识误区——以《全民健身条例》的实施为背景[J]. 体育科研, 2010(4): 17-21
- [21] 王伟光. 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0: 63

(责任编辑: 陈建萍)